



新观察

# 类型创作如何走向经典

□吴秉杰

当前对类型小说的讨论,有两种主要倾向。一种从传统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角度予以概括、探讨;一种则主要谈当前网络中出现的类型小说,玄幻、穿越、盗墓等并给予评价。我觉得应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用历史的、动态的观点看待各种类型小说,以获得对类型创作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要对于类型小说有一种扩大的、符合其普遍本义的理解。谈到类型小说,以往我们经常谈到多是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犯罪小说、武侠小说等等,中国传统创作中也有公案小说、历史演义小说,以及清官贪官、才子佳人等,这是一些沿革已久、比较成熟的类型创作。但类型小说、类型创作仅限于这些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明清小说四大派,我认为除人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外,其余三派差不多都可以归入类型化创作。同样,在当代文学领域中,类型小说创作也是主流。上世纪50年代末被称为是当代长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战争题材创作与农村题材创作这两种小说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我看来,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类型小说范围。战争小说,特别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如《平原枪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等,其基本线索、内容都相差无几。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是表现农业合作化的创作,大量的作品,其人物谱系只要看一下其阶级或家庭出身,例如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或地富分子,主要人物便都可以在作品中获得定位,类型显然更为明显。“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也有类型化的趋势。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乃至现在流行的官场小说,以及越来越多的家族小说,渐渐地,也能看出一种类型的趋同性。由此可见,类型化几乎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必然、普遍的现象。我认为对于类型小说应该有一种扩大的范畴或较高的视点。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具体地研究一种自己已认定的、更为成熟的类型小说。在美学史上,“类型”概念的出现比“典型”要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突破、发展而形成的。但正因为二者存在联系,一些类型小说中也能产生典型(如像《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更

重要的是,文学上类型的概念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本身也是一种概括,包含着特定的内涵和某种精神品格的要求。对于这种精神品格的审美认知与深入分析,恰是类型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它自然也包括当前正在形成与兴起的各种类型创作,以获得对类型创作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类型小说可以说是在一种类型的规范内的创作,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审美意识范围内的创作。在更多情况下,它又可以说是一种在传统规范、传统审美意识下的创作。类型创作与读者业已成熟和定型的审美心理、审美要求是同生共存的,这正是它易于和我们沟通并且拥有广大读者的原因。譬如传统类型中的英雄传奇里,扶危济困、助弱剪强、一诺千金是它不可更移的基本特征,你不可能颠倒地表达。又如阿嘉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罪犯总是隐蔽得很深,使你猜不到凶手是谁,然而犯罪的根源又无例外地都是为金钱与财富,没有一部小说写到为“爱情”而杀人。因为若是后者,便会引起一种尖锐的价值冲突,越出通俗侦探小说范围,演变成类似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问世,传统的小说写法都被打破了。这是指它突破了以往才子佳人的模式、规范,而这一点也正与《第二十二条军规》进入英语辞典并成为大众用语一样。钱钟书先生在为《译林》创刊10周年所作的题词中说:“《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的公认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有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文艺社会学’阐明理解外国当前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是较好的指南。”从广义上说,我们都是读着各种类型小说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能说自己只阅读或专门阅读“纯文学”。对于类型小说的轻视,源于一种狭隘的文学观。我们的审美意识具有继承性,且有一些基本、不可动摇的部分。因此,现在的问题与矛盾便不是我们是否承认类型小说,而是认清类型小说的性质、特征与局限,寻求发展和提高。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类型小说

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它自身也在不断地上升,同时形成不同民族各自的特色。西方类型小说从最初骑士小说、罗曼司小说渐渐演变,转向以金钱、财富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多类型的创作;中国有侠义、言情、公案、传奇、演义各种类型,而从清官贪官到当今官场小说,似乎也一脉相承。日本的推理小说,如森树诚一、松本清张、石川达三等人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势力,揭露财界与政界的勾结等,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私小说”相对被称“社会派”小说。美国的各种畅销书,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由最初的黑手党、美苏争霸、东西方间谍战,直至后来的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电脑黑客,无不被写入作品之中。一些被认为是类型小说的创作,由于其突出的艺术贡献和艺术表现,能与新的话语环境相结合,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接受,也可能成为经典作品,这可以称之为通俗文学与类型小说经典化的过程。譬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便是如此。而如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考验,或许也已可称之为经典。约翰·勒卡雷的一部间谍小说《寒风孤谍》(直译“从寒冷中归来”)据该书前言介绍,这一书名短语现已进入到了英语大辞典,而这一点也正与《第二十二条军规》进入英语辞典并成为大众用语一样。钱钟书先生在为《译林》创刊10周年所作的题词中说:“《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的公认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有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文艺社会学’阐明理解外国当前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是较好的指南。”从广义上说,我们都是读着各种类型小说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能说自己只阅读或专门阅读“纯文学”。对于类型小说的轻视,源于一种狭隘的文学观。我们的审美意识具有继承性,且有一些基本、不可动摇的部分。因此,现在的问题与矛盾便不是我们是否承认类型小说,而是认清类型小说的性质、特征与局限,寻求发展和提高。

回到当前的类型小说创作。我觉得,主要问题是目前尚缺乏一支优秀的、成熟的类型创作的作家队伍。许多作家事实上离不开类型化,却又贬薄类型,认为它是低层次的,缺乏对于特定类型深入发掘的自觉意识。类型写作需要不同的、丰富的知识储备,特定领域生活的积累和认识,也要具备对于人性的深切认知和艺术想象力,而我们的类型小说主题宏大,却无法写出高于一般读者想象力的作品。在西方的畅销书作家队伍中,有文学硕士、前外交官与情报部门官员、众议员、总统的夫人和女儿(如罗斯福夫人、杜鲁门的女儿)、获得爵士与院士称号的作者(如克里斯蒂、西默农),也有医生与律师(如罗宾·科克、约翰·格里森),当前网络上流行的穿越、盗墓小说,可能受到丹·布朗历史穿越创作的影响。以上所列是一支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对于读者有启迪心智、审美普及、寓教于乐的作用;而这类作品与西方先锋小说的分工和区别,似乎又有着保卫西方文化传统的作用。我们也要重视与发展自己的类型小说,并在认识其规律性的基础上寻求更高水平的突破。例如,海岩的小说颇受读者欢迎,破案、人性与爱情构成他小说的三要素,而三要素的不同组合及情节的千变万化,则体现了作者一定模式内的想象力。何家弘是人大法学院教授,他写了一组书名都以“人生”开头的犯罪悬疑系列小说,专业、智慧、想象力以及对于社会人生复杂性的洞察和对于犯罪心理的深刻刻画,使他的作品比同类创作具有明显高出一截的水平。麦家的《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对于类型小说前所未有的一个肯定。但倘若读过他之前所写的《解密》和之后的《风声》,便能明了他的获奖并不是偶然的。文学当然不会抛弃作为发展的基础部分的各种类型小说,不会抛弃属于类型小说的最广大的读者,不会抛弃传统审美意识。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类型小说的理由。

## “类型文学”现象笔谈

### 关注

女性文学创作在本世纪以来产生了一些变化。要对这种变化作出某种概括,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概括总是以牺牲丰富生动的存在为代价的。然而循着它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创作的轨迹,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作出某种描述,即:从性别对峙到多元化书写。

先从林白说起。林白被认为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一个人的战争》《青苔》《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等长篇和其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奠定了她在女性写作界的地位。但是,从《玻璃虫》(2000年)开始,再到随后的《枕黄记》(2001年)、《万物花开》(2003年)、《妇女闲聊录》(2004年),林白的创作空间和视界有了很大的拓展,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使读惯了她的那些“私人化写作”的读者和评论家有些不认识她了。那么应该如何读解和评价过去的林白和如今的林白呢?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但突然有一天,她听到了别人的声音,这声音“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林白:《妇女闲聊录·后记》)。从《枕黄记》开始,林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从幽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林白创作中正在生长的一些新的元素。林白不再耽溺于私人空间了,她尽力打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枕黄记》既是她的一次跨文体写作的实验、一部个人化的长篇记录,同时也表现了她对大自然和底层人的真诚情怀。而在《万物花开》这部怪异的作品中,林白则把目光投向了乡村——这个在她过去的作品中没有触及的领域,通过一个长鼻子的大头乡村少年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奇异、荒诞、贫困但又充满活力的乡村生活的面貌。在《妇女闲聊录》中,她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乡村,以闲聊的形式,让小说中的人物现身说法,再现了辽阔的乡村大地上种种生活情状。这种生活情状粗鄙而质朴,与其相匹配的是粗糙质朴但又生动、鲜活、民间的话语——一种被称为“闲聊录”的形式,构成了这部小说原生态的特征。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林白这部小说确实有些可疑之处,但我在看到的首先是林白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平民视点和平民情怀,从充满激情的女性主义书写转向日常化、平民化的女性书写,这也是新世纪女性写作的一个新走向。在这样的女性写作中,性别对抗的倾向被搁置或者被隐匿了,代之的是对粗糙质朴的世俗女性生活和情感的描摹与表现。

再说铁凝。恐怕很难把铁凝归定为“女性主义写作”或者“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铁凝本人也从来不正面表示对“女性写作”、“女性视角”之类说法的认同,却提出过“双向视角”、“第三性视角”的观点,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铁凝:《玫瑰门·写在卷首》)。尽管如此,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仍然是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写作,关注女性命运、注重女性个人情感的开掘是她作品的基调,像《麦秸垛》《玫瑰门》《大浴女》等都是如此。但是,在新世纪,她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笨花》却是她创作的一次大突破。如果说她以往的写作还是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的话,那么《笨花》则完全完全是“中性”的写作,或者像她说的是“第三性视角”的写作。不过,《笨花》整体艺术风格的“柔顺之美”,作者对人性和历史的宽容态度和永远不变的柔美之情,却是“铁凝创作一以贯之的精神主脉”(郁元宝:《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这就是说,《笨花》与铁凝以往的创作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看看笨花村中的那些来自于本土的人物,不要说那位经过战火洗礼、有着传奇般经历的老军人向喜,以及作为冀中平原抗日救亡组织成员的年轻女性取灯,就是作为最普通平凡的群众西贝梅阁和西贝二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最后都走向生命的终点——死于抗日救亡的第一线,虽然他们死得没有像刘胡兰、江姐那样轰轰烈烈、大义凛然,却也视死如归、淡定从容。在民族危难的年代,他们“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虽则平凡如“一捧尘土”,却也“熠熠生辉”。与铁凝以往的小说主要动用了个人生活的经验和体验不同,《笨花》则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体验中超越出来,有了更宏阔的资源背景。另外,《笨花》中虽然也刻画了一些女性形象,但突出的还是以向喜及其儿孙辈向文成、向有备为代表的一群男性形象。铁凝的创作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如果再用“性别”的标尺来分析和评断,那就要南辕北辙了!

如果说,新世纪以来,林白和铁凝的创作重心已经从描摹女性个体的情感和命运“位移”的话,那么,严歌苓却依然坚守这一重心。自1989年出世以后,她不断给国人带来惊喜,以女性作家的细腻书写了一部部女人的情感史。《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就是她在新世纪书写女性情感和命运的三部所谓“史诗性”作品。

同样是写女性的情感和命运,不少女性作品格局都显得比较小,多半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时间和空间里,资源背景也比较单一,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体验和体验,我们很难从这些作品中捕捉到时代的印迹和人世的沧桑。严歌苓的作品则不同,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几部长篇,都是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主人公的情感和命运都与时代的印迹和人世的沧桑相勾连,有一种大气象。严歌苓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还在于作品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力量——那就是作者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和多鹤(《小姨多鹤》)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具有丰富的人性和人类性的艺术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我们过去的作品中几乎是没有见到过的,这就是一种“突破性、创新性的写作”。

用这样三个个案来概括新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很不全面的。新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丰富多姿,但也庞杂纷乱,有精品,也有垃圾,有可以留得下来的,也有稍纵即逝如过眼烟云的,一如整体的文学创作一样。但无论如何,比起上个世纪来,它还是有所变化,有所发展的。说女性文学占据了文学的半壁江山,恐怕并非夸大其词!

### 新作快评 乔叶《龙袍》,《绿洲》2010年第4期

## 可批判的现实与可批判的文学

□李勇

大款的妻子,小说坦承“我们”的结合完全是“一笔买卖”——“我用青春的硬件和老李金钱的硬件扎实地签了这一笔婚姻合同”。

“我”这样的女性显然是为传统乡村礼法所不容的,但传统乡村礼法这一不变的伦理价值观念已经在变动的时代里支离破碎了,“我”的离经叛道是礼崩乐坏的结果,甚或是它的原因,然而更无可质疑地是它的一部分。因此,“我”在这里已经无法再像鲁迅小说中的“迅哥儿”那样,做一个忧郁而严厉的审视者、批判者,“我”失去了这样的资格。和鲁迅相比,乔叶及其同代人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古旧的乡土中国,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时代现实远为纷乱芜杂,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我”无意于“迅哥儿”式的审视、批判,她只源自本能地伤感于她在支离破碎的人物之一,他表面上是历史错位造

碎的现实中感到的变化和失去,但在理智上却更快意于这种变化和失去所换来的酬报与实利。

当然,“我”无意于审视和批判并不代表作者也无意于此,在对乡民私人性格的描写上乔叶依稀承袭了乔典运、阎连科等河南作家一贯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但与作品对时代现实整体的刻画相比,这实在是无足道的。文化批判所惯有的那种震撼力已经彻底让位于对纷纭现实的忠实呈现——这典型体现于“我”与现实的那种熨帖而相得益彰的关系。也许,“无意于”的说法对作者而言并不准确,毋宁说,她是无力批判。是的,面对“乡村该往何处去”、“乡村会往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性困惑,谁又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在《龙袍》中,老忠是乔叶着意塑

造的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喜剧人物,但他公正、善良却透出一种人性的温暖,而他对集体主义和公社时代的愚昧和眷恋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好笑,反而更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身上那种对于生活的微末的期盼和愿景,它是那么微弱,又是那么坚韧,正是它的存在,如烛光一豆,使晦暗荒芜的生世不致陷入永劫。老忠的形象仅仅是作者充满感伤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他的善良所换来的病疾和落寞,只让他和他所在的乡村世界都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寂寥与哀伤,凝聚不起让我们感到温暖、鼓舞的力量。

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乡村”已经成为当下乡村叙事的“主角”,相应被轻忽和偏废的则是人物,这一所轻和所重并非有意,但却正让我们见到了当下乡村叙事的一种无力感,它源于现实本身的巨大与复杂,更源于叙事者在面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现实的无主与彷徨。忠实地呈现这一现实和对此现实的感受当然无可厚非,但对文学写作而言,“人”始终是它终极的关怀对象,那些底层小人物,那些悲剧命运的主体,他们的受苦、他们的期盼,他们的希望所系和幸福所系,这应该是一切关怀与救赎的出发点。

### 2010年第五期目录

视点阅读  
春嫂的谜语(中篇小说) 郭海燕

小说快递  
纸花炮(中篇小说) 萧笛

吕芳诗小姐(中篇小说) 残雪

女人的战争(中篇小说) 杨小凡

缪斯之眼  
食指近作五首 食指

欧阳白近作八首 欧阳白

话语  
理想者的忧伤与守望——梁晓声与北师大老师的对话 梁晓声

谭五昌 梁振华等

写作:情怀比技巧更重要 梁晓声

2010年第五期目录  
视点阅读  
春嫂的谜语(中篇小说) 郭海燕

小说快递  
纸花炮(中篇小说) 萧笛

吕芳诗小姐(中篇小说) 残雪

女人的战争(中篇小说) 杨小凡

缪斯之眼  
食指近作五首 食指

欧阳白近作八首 欧阳白

话语  
理想者的忧伤与守望——梁晓声与北师大老师的对话 梁晓声

谭五昌 梁振华等

写作:情怀比技巧更重要 梁晓声

邮发代号:42-26。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3-1079/L。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4-3691。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号。邮政编码:410014。

电话:0731-85983060、85983055、

85983116。传真:0731-85983056。

### 名家三棱镜·叶兆言

革命性的灰烬 叶兆言

叶兆言印象点滴 林舟

小说家的散文——叶兆言散文读札 张宗刚

豁蒙讲坛  
日本人对现代中国的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阅读史 藤井省三

贺昌盛译

文学史新思维  
“世界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贾平凹先生的新文学研究的启示述要 吴培显

文学史视野中的第一次文代会 黄发有

思潮与现象  
“新红颜写作”:一种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 张德明

“新红颜写作”:一种值得关注